

杜威，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他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在华讲学，发表了人们期待已久的《五大讲演》。他所宣传的民主与科学精神，改良主义思想和教育理论，盛行一时，影响深远，同时也引发了不少争论和思考。几十年来，杜威哲学在中国引起起落，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本书全文收录了当代读者已经久违了的《杜威五大讲演》并收入了从当时到当今有关杜威的各种评论，反映了杜威的中国观以及中国对杜威曲折的认识过程。

杜威 谈中国

DUWEI TAN ZHONGGUO

沈益洪 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



世纪回声

SHIJIHUI SHENG

杜威 谈中国

DUWEI TAN ZHONGGUO

沈益洪 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

特邀编辑:尤炜祥

封面设计:池 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威谈中国/沈益洪编.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1.1

(世纪回声书系)

ISBN 7—5339—1367—1

I. 杜... II. 沈... III. 社会-评论-中国
IV. 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9403 号

• 世纪回声 •

杜威谈中国

沈益洪 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飞达工艺美术印刷厂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875 插页 2 字数 310000 印数 0001—5000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367—1/I · 1221 定价:19.00 元

出版献辞

20 世纪的帷幕正在徐徐落下,新世纪的曙光已经照临了人类的窗口。

20 世纪的中国接受过不少新思潮、新观念,这些新思潮、新观念曾经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 20 世纪的中国。

从五四时代起,有一批大师不远万里,亲临中国,通过讲演、谈话和著述,带来新学说,传播新思想,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让我们有幸目睹他们的风采,倾听他们的指点。

他们是大师,是 20 世纪的文化名人,他们更是朋友。他们都抱有中国关怀、中国情结。在我们彷徨不定的时候,他们为我们授课讲学;在我们遭受异族侵袭的时候,他们为我们呐喊奔走;在我们取得成绩的时候,他们为我们欣喜鼓掌;他们的到来,本身就是一种热潮、一种力量。他们坚定的目光、自信的话语、超人的学识,曾经感动过我们的伟人: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鲁迅……也曾激动过我们一代又一代的热血青年,不少青年后来也成为了大师。

他们的学说盛行一时,影响深远,曾经引起过轰动,也引发过争论和思考……

是的,他们与 20 世纪的中国密不可分。或许他们的指点并不十分准确,但历史会记住他们的真诚。

此刻,我们正步伐坚定地迈向 21 世纪。我们不妨把回眸的

目光暂时集中在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大师身上,他们的名字是:内山完造、杜威、罗素、泰戈尔、萧伯纳、萨特与西蒙·波娃。

我们收录他们的讲演和谈话,记录他们在华活动的行迹,选录当时及之后的种种评论。我们没有对这段历史中的是非曲直作出评说,只是试图较为客观、真实地复原这段历史。我们相信,有兴趣于此的读者,自会从这臧否声中,感受到时代风云的拨弄,思想文化观念的撞击,以及与当下生活的或隐或显的联系,从而有所感悟,有所心动。我们愿以此来纪念这些大师,纪念我们共同经历的这段风风雨雨,纪念将要逝去的 20 世纪。

为此,我们盛情推出“世纪回声”书系。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0 年 10 月

2000/10/06

杜威与中国(代序)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教育学家杜威,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在 20 世纪亲临中国的大家之中,杜威的影响最大,对他的争议也最大。

杜威(John Dewey, 1859 年 10 月 20 日—1952 年 6 月 1 日),生于美国佛蒙特州柏灵顿市附近的一个村庄,1875—1879 年在佛蒙特大学求学,后曾任教于中学,1882—1884 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1884 年后,先后在密执安大学、明尼苏达大学、芝加哥大学任教。1899—1900 年,担任美国心理学会会长。1902—1904 年,担任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院长。1904—1930 年,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并于 1930 至 1939 年担任该校荣誉退休教授。1905—1906 年担任美国哲学学会会长。曾被授予美国多所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杜威学识渊博,一生著述颇丰,1952 年逝世于纽约。杜威早年接受美国哲学家皮尔斯和詹姆斯的实用主义的理论,后来形成了自己的实用主义的体系。

杜威曾于 1919 年 4 月 30 日至 1922 年 7 月 11 日来华访问,共计在中国住了两年零两个月 12 天。

邀请杜威访华的,主要是杜威的中国弟子胡适、蒋梦麟、陶

行知等。然而,究竟是什么机构出面邀请,历史上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但主要是北京大学、尚志学会、新学会、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及江苏、浙江的一些教育会。

杜威本来并没有准备访华,他于1919年2月至4月,作为“交换教员”,由哥伦比亚大学派往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讲学。此时,杜威已经是享誉世界的国际名人。得知杜威访问日本的消息后,原先就有意邀请杜威访华的陶行知等,就一面写信给杜威,一面写信给哥伦比亚大学。杜威来华后,所作讲演备受欢迎,又一再延长访华日程。

杜威到达中国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夕,中国知识界极其渴求新知识新学说,因此,杜威所宣传的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改良主义的思想以及他的教育理论,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知识界。

杜威在中国的演讲次数,数以百计,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在北京的系列讲演,二是在全国各地所作的巡回讲演。他在北京的讲演,主要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和教育部会堂举行,主要由胡适等人任翻译。这些讲演,后来由晨报社结集为《杜威五大讲演》出版,不断重印,影响远远超出听讲的人数,一时成为人们争相阅读的畅销书。与此同时,他又足迹遍至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省,这些巡回讲演的内容也被全文记录下来,并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这些小册子,可谓无以数计。

据《胡适日记》记载,杜威本不是一个擅长口才的人,但他每次讲演之前,都作了充分准备,讲演的主要内容,都以书面形式事先交给口译人员,以使他们斟酌合适的中文词汇。

杜威的“五大讲演”,是指他在北京所作的五个系列讲演,共58讲,其一为《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其二为《教育哲学》,其三为《思想之派别》,其四为《现代的三个哲学家》,其五为《伦理讲

演纪略》。此外,杜威在北京还作了关于“现代教育趋势”和“美国民治的发展”的系列讲演。

《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一共讲了 16 次。

杜威从 19 世纪的社会科学讲起,介绍了霍布斯、斯宾诺莎、黑格尔、洛克和卢梭的理论,同时也在分析之中,宣传了他的实用主义的理论。

他指出:不同的人,由于属于不同的“宗教和政治”,属于不同的“经济和家庭的群”,属于不同的“地理区域”,难免会发生冲突,因此,要从政治、思想、经济等方面着手,调整国家、政府、人民三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主张提高“人的权利”,包括“生活的权利”、“行动的权利”、“财产的权利”和“契约的权利”。他所理解的改良主张,一是“民主的保民政策”,二是“利用普及教育,使人人有机会平等”,三是“利用专门知识,研究专门的问题”。

尽管杜威的主张在当时渴望思想解放和精神自由的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界引起了不小的共鸣,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他的改良主义与当时刚刚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格格不入的,对于五四时期中国的现实政治而言,他的言论不免有点隔靴搔痒。

《教育哲学》也讲了 16 次。

杜威首先阐述了教育的必要性,认为“大多数的人对于学问没有趣味,所以我们应该改良学校的制度和教材,使他们也能感受教育的教益”。

接着,杜威提出了“不以学科为中心,而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理论,主张从游戏、运动、手工三方面着手,“以本能为基础,使儿童利用本能,得到应得的知识”。他认为,教育的起点是儿童的生活和本能,教育的目的是为社会培养良好的公民,而学校的

学科,正是其中的桥梁。这里,杜威指出了教育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并讲述了他的名言:教育并不是生活的准备,教育就是生活。

至于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杜威列举了四种方法:游戏、有组织的活动、演戏和工作。他说:“科学的方法是什么呢?科学的方法便是试验的方法。这方法的大意,简单说,便是用人的动作,将一方的心的作用与别一方的天然界的事实连起来。”“试验方法的重要分子,便是‘假设’。这不是空条,也不是武断,只是提出假设事作试验的指挥。”这里,不乏中肯之言,但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他的实用主义哲学的痕迹。

杜威也重视人格教育。同时,他也谈到了学制组织、职业教育等问题。在讲座末尾,他补充说:“现在乘此改造教育制度的机会,中国倘能避免西洋失败的弊病,将来成效一定比西洋为大,我可以断言的。”

杜威的教育理论,几乎为当时刚刚走出私塾教育的中国教育界全盘接受,盛行一时,影响极其深远。比如他后来在南京暑期讲习班的讲演,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男女同校”。以他的教育思想为指导,北京、南京、苏州、上海等地纷纷办起了“实验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实验学校还命名为“杜威学校”。

《思想之派别》共讲演8次。

杜威介绍了哲学史上四种思想派别。一是以亚里斯多德为代表的“系统派”,二是以笛卡儿为代表的“理性派”,三是以培根和洛克为代表的“经验派”,四是他自己的“实验派”。

杜威在介绍这些学派的学说、分析其变迁时,比较客观地指出了各自的优缺点,同时也宣传了他的实用主义哲学。

《现代的三个哲学家》共讲演3次。

这次讲座是应中国知识界的特别请求而作的,目的是为在

罗素 1920 年到中国讲学之前介绍罗素。

他首先介绍了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1842—1910)的实用主义和法国哲学家柏格森(1859—1941)的生命哲学和现代非理性主义,接着,他着重介绍了罗素的学说。不过,他没有介绍罗素的数理逻辑,因为它过于深奥,杜威坦率承认自己也不懂。杜威介绍了罗素哲学其他方面的内容,为中国知识界聆听罗素讲演作了准备。

《伦理讲演纪略》共 15 次。

杜威讲述了伦理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如道德与本能、道德与情绪、道德与欲望、道德与不道德、道德与民主制度,他还比较了东西方不同的道德观念。可以认为,这个讲演是对他哲学讲演和教育讲演的一种补充。

1919 年 10 月 20 日,杜威 60 岁生日之际,蔡元培先生在生日宴会上发表演说,简要地评价了杜威哲学,认为它是由康德的实证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詹姆士的实用主义“递演而成”,并比较了杜威哲学与孔子学说的异同。

杜威在中国的代言人是胡适,他曾撰文引发了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在学术研究的方法上,他曾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把杜威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两条,一是“历史的方法”,即从历史背景出发,研究一种学说的来龙去脉;二是“实验的方法”,认为“实验是真理的惟一试金石”。当然,这与我们所认识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相去甚远。胡适后来衍发了杜威的理论,提出在科学研究上,要“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等理论。

1955 年,继批判俞平伯的红学观点之后,有一场批判杜威、

批判胡适的运动,声势浩大,不少知名学者纷纷撰文,这些文章还结集为《胡适思想批判》出版,其中虽有一些切中要害的中肯之言,但总的来说,对杜威总的态度是彻底否定。改革开放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不少学者开始重新评价杜威,并有一些论文、论著问世。如何从科学的角度吸收杜威哲学的合理内容,扬弃其唯心主义的糟粕,并结合其对中国的影响判断其价值,已成为理论工作者所关注的课题。

几十年来,杜威哲学在中国起起落落,从开始的盲目崇拜,到后来的盲目否定,再到如今的“重读杜威”,可以说,杜威的理论伴随我们走过了这些岁月。

《杜威谈中国》全文收录了杜威的五大讲演,这个讲演集,已多年未刊行,不易见到。作为一个时代的历史文本,杜威到底讲了些什么,其正、谬何在,值得一读。此外,我们还选择了一批有代表性的评论文章,以发表的时间顺序,分为“杜威来华前”、“杜威在华时”和“杜威离华后”三个部分,书后附有杜威在华活动的年表。

我们愿以此纪念杜威来华,愿以此纪念我们共同走过的日子,并愿以此献给 21 世纪的中国人。

沈益洪

2000 年 2 月

于上海大学文学院康桥作坊

目 录

杜威与中国(代序).....	沈益洪(1)
----------------	--------

杜威五大讲演

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	(3)
教育哲学	(82)
思想之派别.....	(164)
现代的三个哲学家.....	(216)
伦理讲演纪略.....	(250)

评论:杜威来华前

致胡适.....	陶行知(299)
----------	----------

评论:杜威在华时

实验主义(引论).....	胡 适(305)
杜威之伦理学.....	蒋梦麟(311)
杜威之论理学.....	刘经庶(325)
在杜威博士之 60 生日晚餐会上之演说	蔡元培(329)
杜威先生与中国.....	胡 适(331)

评论:杜威离华后

杜威传(摘录)	简·杜威(337)
杜威哲学	胡 适(340)
近 20 年来杜威哲学研究综述	顾红亮(363)
杜威在华活动年表	黎洁华(369)

杜威五大讲演

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

毋忘 笔记

这个讲演,前面四篇是毋忘先生记的,第五篇起是我记的。此次修改原稿的时候,毋忘先生还在病院,所以这修改的责任,应该全归我负了。

伏 卢

—

我很感谢北京大学校长、教育部、尚志学会和新学会,使我今天得来此讲演,实是我国际的荣誉。

我这 16 次讲演的题目是“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便是关于人类共同生活的学说。诸位须知学说发生在后,正如人先会吃饭,然后有生理学、卫生学;先会说话,然后有修辞学、文法学、名学。社会与政治的哲学亦然,人类先有制度、风俗、习惯,然后有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

人类有一种天性,遇需要时,自有一种动作去适应他的需要。例如饿了要吃,倦了要睡,久而久之,便成习惯了;却从没有人发生过疑问,吾们为什么要这样? 这样了便如何? 不但没有人发生过疑问,并且不许别人发生疑问,有许多志士往往对于制度、风俗、习惯发生疑问,以致牺牲了性命。历史上的证据很多,

希腊的苏格拉底(Socratēs)便是个最显明的证据。只因他喜欢发生疑问,人家便加他一个妖言惑众引诱青年的罪名,把他毒死。这便是最初社会不喜欢学理的证据。

这样说来,凡是思想和学说,都是讨人厌的东西,便应大家从了制度风俗习惯走,如何还会有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发生呢?大概思想学说的由来,都在遇着困难的时候。譬如走路,遇了困难,才发生造舟车的思想。不但个人的思想如此,便是人类共同的思想,亦复如此,总要一切制度、风俗、习惯,到了一个时代,感着不适,然后才有社会的思想与政治的思想发生。所以社会哲学的发生,一定是在社会有病的时候;政治哲学的发生,一定是在政治有病的时候。

从历史上看去,要是人的身体没有病,一定不会发生医学、生理学、解剖学的。因为人的身体要遇了传染了病,所以才有医学、生理学、解剖学。社会政治亦然,必是人类共同生活有了病,才有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试看历史上希腊哲学的发生,正在它纷乱征战的时候;要是希腊没有这种纷乱征战的情形,决不会有柏拉图(Platon)、亚里斯多德(Aristotelēs)等的学说发生。我的意见如果不错,那么中国各种学说发生,亦当如此。要是在老子、孔子的时代,中国的社会与政治没有病,也决不会有老子、孔子两大派的学说发生的。

以上所讲的,不过是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发生的原因,现在要讲发生以后的影响。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既因社会和政治有病,然后发生的,那么还是种空言病状的诊书呢?还是种真能医病的药方呢?譬如汽机的汽,是呜呜然放出的呢?还是真能发动各种机械的呢?这一点是应当注重的,也是现在所应当讨论的。

我提出这个问题,是论学理与事实的关系如何,就是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对于实际的社会与政治,有什么影响。关于这个问题,有两派极端的学说:(一)是极端的理想派。这派以为学理